

《宗教与世界》丛书

社会与宗教

RELIGION AND SOCIETY

[日] 池田大作 著
[英] B. 威尔逊



四川人民出版社

社 会 与 宗 教

[日] 池田大作 著
[英] B. 威尔逊

梁鸿飞 王 健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年·成都

社会と宗教

池田大作
Bryan Wilson

根据日本讲谈社 1985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汪 游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盛寄萍

·《宗教与世界》丛书·

社会与宗教

(日) 池田大作 著
(英) B.威尔逊
梁鸿飞 王 健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厂激光照排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6 插页 6 字数 298 千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1552-6/B·74 印数:1-3000
定价:9.95 元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愿的渴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

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 光 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中文版《社会与宗教》

序 言

欣闻中国将出版牛津大学教授威尔逊和我的对话《社会与宗教》，作为对话者之一，深感光荣之至。

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使我感到一种与在其他国家翻译出版略有不同的意义，因为说到中国时，我的心里便会涌起“坚韧的民众”这一形象。

民众强大，民众贤明——脚踏实地、深深扎根于大地的民众，他们的无穷智慧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搏动在滔滔奔流的中国的宏伟历史当中。

中国自古就有的“实事求是”的观点也是其表现之一。就事实求真理，这绝对不是一种观念性的轻浮概念，而是一种永远把力点置于现实的追求真理的目光。进而言之，在政治、经济、艺术等文化诸方面，这种目光，贯穿着片刻不脱离“人道主义”地平线的彻底的现实主义。

作为佛教徒的我，仿佛从发祥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完全体系化的背景上，看见了如上丰富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土壤。

屹立于佛教史上的中国隋代天台大师智顓说过：“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法华玄义》）就是说，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等与真实的佛法决不矛盾。一般都认为，宗教是形而上的思想层次，与形而下的经济、产业等分属不同世界。然而，佛法本来就不是脱离于时时进步、变化的社会和混乱的现实。反过来，应该说它是与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不可分的，并给予这一切以生机蓬勃的活力，在价值创造上具有导向性的重要使命。

这也是所谓八万法藏的经典群中被视为经中之王的《法华经》的思想精神。在产生《法华经》的母国印度，佛教虽贯彻平等主义，却大有从现实游离的倾向，而在时代和风土迥异的中国，如天台智顓所代表的那样，从不曾须臾游离于现实的佛教怒放盛开，这一事实真令人惊叹。

正因为有了这丰饶的中国大地，在日本的 13 世纪，真正现实的、革新社会的日莲大圣人的佛法才得以延续。

作如是观，对于我前面所说的“略有不同意义”的感想，就会有所理解了罢。

在对话中，讨论“何谓宗教”、“宗教如何与社会相关”等主题时，言及朝向 21 世纪的人类所面临的诸问题。我衷心希望这个对话能为中国读者所爱读，尤其能给青年们一些启迪。

最后，值此对谈中文版出版之际，谨向译者梁鸿飞先生、王健先生，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关源博先生、副社长邓星盈先生，以及何光沪先生、汪淼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池田 大 53

序 言

从 1978 年 12 月下旬开始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本书的对话者之一威尔逊应日本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的邀请，访问了日本。在他来访的初期，本书的另一位对话者，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曾设宴招待。席间，两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虽然我们彼此之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就其社会学术观点来说，则并无太大距离，因此谈话进行得非常愉快和兴奋，以至在不知不觉中竟远远地超过了预定时间。

我们彼此坦诚地说明了各自的世界观，甚至连一些观点的细节也毫不掩饰。因此，虽然一位是新宗教运动的领导人，一位是学者型的社会学家，但我们并没有被各自领域的固有概念所妨碍，而是交谈得非常融洽。这样，我们都自然产生了再找机会见面，进一步就更加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愿望。在晚宴结束时，我们立即做出了继续交谈的决定。

此后，我们或是在日本，或是在欧洲，多次进行了谈话，并且互相交换了各自撰写的长篇文章。最后我们把双方的发言汇集在一起，经过编辑和删节，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这部对话集。

长时间的交往使我们产生了亲密的友谊：各自不论撰写什么文字都互相交换；我们互相赞赏，时常陷入“大大斧正社会”的自我满足之中。这样的感情由于对话本身的愉快而被更加强化，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不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们不会成为感情的奴仆。

这部对话集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希望对其他人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我们决不愿意人们陷入这样的一种错觉，即认为，书中对很多问题已有结论。

本书所讨论的各种问题，我们都没有作出结论，而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讨论时的原貌。对于所有引起我们兴趣的主题来说，我们不一定是专家，而且就其中某些问题来看，还可能是门外汉。因此，我们从未梦想过以最高权威的面目出现。我们完全懂得，重视其他人的观点更为重要。对于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的见解和学术研究动向，我们既非常关心，又认真地进行过思考，当然我们还会就某些问题加以评论。由此，大概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关注社会科学理论及学术发展的吧。

本书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已经被有关学科的专家们相当广泛地探讨过，并确实形成了已被人们认可的具有代

表性的观点。但这并不能构成我们继续探讨的障碍。虽然不能说我们对一切问题都研究过，但我们的出发点却是：不仅要探讨日莲大圣人的佛教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而且要尽可能广泛地对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作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在书中，我们所互相交换的各种观点，表明了我们作为评论者的态度。

我们的整个对话，都没有局限在我们二人的专业领域内。因为我们的目的，既不是概括性地说明大乘及日莲大圣人的佛教理论，也不是介绍宗教社会学的内容。因此，那些想要了解以上内容的人们，应该阅读其他书籍来满足自己的愿望。

本书在论述宗教——佛教及其他各类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的重要影响的同时，还涉及宗教在伦理、哲学、心理学、医学、组织、历史等各方面的影响。我们很想通过宗教领导者和宗教社会学家的相互讨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因此，这部对话集不仅适宜于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读者和非专业读者，而且特别适宜只在一个领域是专家的人。因为后者在自己的学科之外，同样是外行。

虽说佛教和社会学是我们研究的领域，但我们决不可能在本书的每一部分都提供这两个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材料。像我们这样的专家，非常希望进行广泛的公正无私的讨论，并自由地交换彼此的观点，以便引起其他专家及更多的人们继续参加讨论。这本对话集涉及了生物遗传工程

学、人工绝育、宗教自由、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人性的本质等问题，同时还对被称为“现代争论”的各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我们确信，其中难免有外行之见。

早在对话之前，我们就对对话中的几乎所有问题各自进行过反复思考。在以后的对话中，我们又相互坦诚地向对方展示了自己的思想，而且超越了日本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表述了各自的观点。这种沟通使我们能够从一个不曾有过的视角更加缜密地进行思考，并且能够更加充分地重新评价以往的思想观点。

在对话中，也许有时我们不能理解对方的思想，但这决不是由于为我们进行笔译和口译的人员的水平不高造成的。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不同文化圈的差异造成的。因为任何个人之间的谈话（除了严密的数理语言，几乎一切语言都是如此）都不可能在仔细考虑了的对方的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背景之后才进行。因此，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在相互交谈时，就容易产生语言和思想方面的障碍。这种状况在我们刚开始接触时尤为明显。就我们的对话来说，尽管最初在翻译操作方面有些障碍，但实际上这些障碍反倒成为我们更加深刻认识自身的阶梯。因为我们都得迫使自己把所要叙述的思想观点重新思考以使之明确化。无论哪种语言，以它为母语的人们往往对于定义是否明确清晰、假定与论点是否构成逻辑体系不加以严密的思考就能理解，而且还能原封不动地迅速加以利用。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候运用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命题。这对同一个文

化圈中的人们来说有着稳定的共同基础。因此，同一个文化圈的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即使概念模糊或者是运用直观性的语言方式，对方也能理解言外的暗示和所要表达的意思，能够达到互相交流思想的目的。

笔译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益的锻炼。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把隐含于文化内涵中的假说加以明确；另一方面，我们都得把以前自以为已明确的概念重新加以评价。这项工作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非常感谢不仅克服了语言上而且克服了文化方面的障碍的各位笔译者和口译者。特别是对独立承担了日译英翻译的理查德·L.肯基君，池田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们希望，这本对话集不仅成为连接东方和西方两个文化圈的桥梁，特别是成为连接日本和英国的桥梁，而且也能成为现代世界不同学科之间对话的样本。当今这些学科日益专门化，但相互之间的对话却显得不足。

过去，曾经有一些学者希望寻求广博的知识，他们对于相互隔阂非常的各个学科领域都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博学者把各类知识在头脑中互相补充融合的时代。这些博学者把各狭窄领域中的专家们所使用的专业知识加以融合渗透，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知识范围。由于他们自身具有非凡的能力以及探求一切的理性力量，再加之他们的巨大的努力，使他们对各个学科领域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今天已不是这样的博学者的时候了，我们谁都不是和已不复存在的那些博学者同类的人，也不打算陷入模仿

他们广博能力的错误幻想之中。然而，我们却希望，自己具有那些博学者们的探索精神，同时也希望，把那些一个人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把那些一个人通常容易疏忽的各种问题提出来，共同重新加以探讨。

虽然我们的愿望很好，但我们二人各自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一个是活跃的佛教团体的领导人，一个是宗教社会学家。二者的目的、方法以及假说有着根本的差异。尽管如此，本书讨论的本质性问题，即宗教的社会任务，却是我们双方都非常关心的。在对话中，我们力图从各方面理解彼此的前提和出发点，但在有些方面，我们也提出了某些不同的看法。

当然，一个宗教社会学家（特别是注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活动的宗教社会学家）与一个宗教领袖进行对话，决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是，为了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讨论宗教问题，社会学家应该暂时从他积极从事的调查活动的角色中退出，宗教领袖也应暂时从教团弟子的指导者和忠告者的主要角色中退出。这样做并不过分。进行这样的讨论，对于我们中的一方来说，宗教的事实和现象在伦理方面始终是属于中立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意味着，应该暂时避开在方法论上把经验主义合法化的研究态度。对另一方来说，在说明日莲大圣人的佛教理论时，也应明确他所要表明的价值观和所要阐明的问题的本质，而在对话中不涉及他所主张的立场。总之，我们的对话是立足于客观的探索精神。

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之间就能在一切方面相互沟通，并且能够互相提供各自在日常活动中对事物的观察与思考。构成我们沟通的基础的东西，既不是从事研究活动的学者的态度，也不是解说教义的佛教领袖的态度，而是客观的态度。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超越各自专业领域的局限，尽管这会使人们认为我们“无视通常的重要观念和价值观”。

有些人也许会这样认为：一位宗教领袖与一位不分享佛教信仰、甚至不归属任何宗教的学者进行没有任何约束的讨论，大概是很困难的。况且，双方的对话记录还要交给自己的弟子们阅读，也许这更增加了一层困难。同样，宗教社会学家使用的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明确的价值判断的方法，在论述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时候，大概也会有所不适。然而，我们谁也没有因这样的担心而产生犹豫。

关于对话的动议，首先是池田提出来的。他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很明确：不仅要把这本对话录提供给创价学会会员，而且也要把它提供给广大的社会一般成员。这种态度完全证明，池田作为佛教领导者的立场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威尔逊也确信，由于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重要性，人们完全能够决定自身对所关心的问题的态度。同时，人们也应该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无论我们两人的价值观有怎样的差距（其间的若干分歧在以后的文字中也能表现出来），但我们却懂得进行自由的、理智的讨论的价值之所在。尊重这种价值的精神在我们的对话中肯

定能够具体地见到。

西方的读者往往把佛教上座部的彼岸志向当作佛教的全部。因为这使他们想起基督教的圣礼仪式、救赎论、末世论以及某些神话。对于佛教的这种理解，也许是只从社会学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的结果，即把观察的焦点只放在宗教的社会任务方面。还有可能是出于错误的想象。但实际上，佛教的理论完全与此相反。日莲大圣人的佛教理论从根本上说来有着非常重视现世的倾向，他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把握。由于这个前提的存在，使我们的对话有了共同的基础并能很快沟通。日莲大圣人的佛教理论的特征，确实使佛教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对话很容易进行。因此，即使在我们二人的见解有着分歧的场合，占据我们心灵的东西也是近似的。对于信仰的合理性问题，我们并不关心，我们也不想对宗教本体以及各种宗教作出最终的评价与结论。因为我们中的一方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对另一方来说，这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

在本书中，我们从宗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角度进行透视，把着眼点放在生活在急剧和彻底变化着的世界中的人类方面。在此前提下，我们讨论了宗教感情的本质、奇迹的特征、死亡与生命观的意义、神秘主义、理性的限度等有关宗教的各类问题。另外，若干零散的话题也在对话中占了相当篇幅，特别是在本书的后面的部分。遗憾的是，有很多应该论述的基本问题，本书没有能够涉及。那些零散的话题，纯粹是交换意见性的。它们是在讨论特定